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李金华

【摘要】《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关键词】章学诚;《史籍考》;《上李观察书》

【作者简介】李金华,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史学研究(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23.4.183~19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A12788002)。

《史籍考》是清代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宗旨,内容除史部外,而兼经、子、集。因其气象宏大,吸引了众多官员赞助支持、众多士人参与编纂工作。《史籍考》编纂自乾隆至道光,手稿数易其主,最终毁于战火,未能刊行于世,成为中国古代史中一大憾事。其纂修缘起及经过扑朔迷离,引起学界关注和探讨。如林存阳先生将《史籍考》的编纂分为三个阶段,肯定毕沅、谢启昆、潘锡恩等官员对《史籍考》编纂的推动作用^①;乔治忠先生探析章学诚投奔毕沅幕府诸多细节,褒扬周震荣对《史籍考》编纂的倡导之功^②;笔者也曾通过考察周震荣《上李观察书》一文的写作时间、受文对象及内容,提出时任直隶通永兵备道的李调元为编纂《史籍考》的最早提出者,周震荣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最初设计者^③。不过笔者近来通过对李调元、周震荣及章学诚的学术经历及其著述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章学诚不但是《史籍考》体例与内容的总设计师,而且李调元《史籍考》编纂设想的提出,也深受他的启发和影响,因此,对其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

一、章学诚最早提出《史籍考》编纂设想

当前学界多认为《史籍考》的最初编纂是在乾隆

五十三年(1788),由学者型官员毕沅赞助、章学诚主持开局。而据章学诚自述,编纂《史籍考》之最初动议,则是由其好友周震荣提出,“丁未之仲冬,其端自永清周尹发之”^④。但是,收于周震荣《四寸学残存》中的《上李观察书》^⑤则表明,《史籍考》编纂的首倡者另有其人,并与周震荣关系密切。《上李观察书》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任永清知县的周震荣致时任通永兵备道李调元的一封信函。开篇一句“昨章进士来,仰知阁下将撰《史籍考》,此不朽盛业也”,此句除说明了首先提出编纂《史籍考》的并不是周震荣,还提到两个人物,一是“章进士”,即乾隆四十五(1780)年进士及第的章学诚;二是“阁下”,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除通永兵备道的李调元。初读此句,仿佛首先是李调元萌生纂修《史籍考》的想法,告诉了前来拜访的章学诚,章学诚又将李调元的想法转与周震荣,周得知李调元“将撰”《史籍考》后,就《史籍考》编撰的诸多事宜与李调元通过信函深入交流。但实际上,李调元“将撰”《史籍考》的想法,是自己的别识心裁,还是受到章学诚的启发,尚需进一步探析。

《上李观察书》的受文对象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一生醉心于访书、藏书。乾隆四

十六年(1781),李调元由广东学政升任通永兵备道,驻通州。由于通州与京城近在咫尺,李调元得以时时阅览京城四库馆中大量书籍,“每得善本,辄雇胥录之”,倾毕生之力校刻的大型丛书《函海》的编订校刻工程即始于此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完工,“哀然成帙,真洋洋大观矣”^⑥。《函海》不仅收录大量《四库全书》未收的珍贵文献,更为可贵的是,李调元每得一书,即认真阅读、仔细校勘,并为许多著述撰写序跋,考证作者生平,从体例、内容、版本多方面评判其价值与特点,如指出陆友仁《吴中旧事》“盖记其乡之轶闻旧迹,以辅地志之缺者。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评价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类书之起当在此时,故以此录为首考”。^⑦大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势。

《函海》虽收录诸多珍本,但李调元以“不徒以海侈其经史子集之富丽”为编书宗旨,该丛书主要以收录与保存蜀人著作为主。其在《函海总序》中所言“实以年力半衰,欲借读书以化其凿枘不入之顽质也”^⑧,虽有自谦之意,但亦表明,为自己增长学识之用乃是其校刻《函海》的主要动机。故其《函海》编纂体例简单,并未按照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标准编排体例。^⑨李调元虽对《函海》诸篇详加校订,但若编纂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并非只是考证错讹、辨析版本,更需设计谨严的义例及宏大的规划,恰如章学诚所认为的,经、子、集“三家多与史相通。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是抉择去取,不无搔首苦心。《史考》之牵连,不如《经考》之截然划界也”^⑩。李调元虽学富五车,但一生专注文论、诗论,并不以史学目录学见长。因此,从李调元编书的初衷来看,在校刻《函海》的同时不会有另编一部工程浩大的史学目录著作《史籍考》的想法,从其学术经历分析,他并不具备这样的专门学术素质,故不可能独立地提出《史籍考》的编纂设想。

但是,向周震荣述及李调元“将撰《史籍考》”的章学诚,自小对史学尤其是校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章氏16岁时,就系统学习了纪传体的写法,独自编成一百多卷本的《东周

史》。21岁时“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24岁时即对史学著录提出独到见解,“所笔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⑪。此后,他对目录校讎之学深入钻研,乾隆三十一年(1766),章学诚“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⑫。乾隆三十八年(1773),他“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讎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⑬,在此基础上,至乾隆四十四年(1778)章学诚完成《校讎通义》四卷。

理论建树的同时,章学诚积极主动地寻找将其校讎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以彰显其理论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乾隆二十九年(1764)参编《天门县志》时对于时人多将典故、行状、碑刻等人艺文志的做法进行批判:“良由典故证据诸文,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则事无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简之羞;行状碑版诸文,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则人无全传,不得不强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数。”^⑭乾隆三十二年(1767),朱筠受诏撰修《顺天府志》,嘱章学诚经纪其事,学诚遂将向与朋辈抵掌剧谈的目录学主张用于该志书的编纂,“颇得行其六七”^⑮。乾隆三十八年编纂《和州志》,乃是出于“《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也”^⑯的考虑。同年,他又“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后以为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编为一卷”^⑰。章学诚校讎学理论最为成功的一次运用则是乾隆三十七年(1771),其在安徽学政朱筠幕府,助幕主朱筠成功奏陈购访遗书。

对于朱筠购访遗书的上奏源自章学诚的建议,后人早有觉察,曾有章学诚“因请搜访遗书,仿刘向

《七略》条别群书,各疏原委,学士遂有征书之奏,而《四库全书》之馆,自此开矣”^①的说法,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其实,翻阅《校讎通义》,朱筠“征书之奏”中的四点建议在该书中皆有体现。如,奏折提出的“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官抄其副,给还原书”之建议,与《校讎通义》中“校书宜广储副本。……夫博求诸本,乃得讎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②的议论相呼应。奏折中提出访书的策略原则“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奔日益广矣”,在《校讎通义》中亦有“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的议论。而此一陈述直接启发了朱筠提出校阅《永乐大典》的建议,“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观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此外,奏折中“著录校讎,当并重也。……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的建议,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亦有类似论述:“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③此段文字中作为“诸书之总要”的“辑略”,即是朱筠奏折中的“撮举大旨”。

古代士人对于国家文化建设,没有直接进言的机会,章学诚就曾发出“天何为而生才?才何为而见需”^④的感叹。而投身于高官门下,不仅可满足谋生需求,通过辅助高官大吏上奏来表述自己的学术主张,亦不失为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极佳方式。因此,虽然搜访遗书的奏折名义上属朱筠之功,而章学诚借朱筠之口向朝廷陈述自己目录校讎理论并得到认可与实施,这实则为其坚持捍卫自己的学术主张打

了一剂强心针。章学诚醉心史学,乾隆四十四年(1777),他在《校讎通义》成书后,就时时寻找将自己的校讎理论付诸史学著述编纂实践的机会。乾隆四十七年(1782),当精于目录校讎之学的章学诚看到李调元正搜书、校书时,提议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的史学目录学著述就理所当然了。李调元虽提不出这个建议,但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其学术价值与意义还是有着基本判断的,因而他接受了章学诚的建议,这也就有了《上李观察书》中所说的“章进士来,仰知阁下将撰《史籍考》”之事。因此,编纂《史籍考》设想的提出,应该是章学诚直接影响的结果。

二、章学诚最早设计了《史籍考》内容与体例

《上李观察书》对于《史籍考》的编撰体例、大致结构及各部分内容的处理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甚至成为此后章学诚开展《史籍考》编纂工作的实施纲领。此后,章学诚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所作《论修〈史籍考〉要略》及嘉庆三年(1798)所作《史考释例》中对《史籍考》编纂的规划基本承袭了《上李观察书》中的观点。^⑤表面上看,仿佛是章学诚受到《上李观察书》的启发,其实,通读章学诚此前成书的《校讎通义》及其他著述和文章,《上李观察书》中诸多观点在章氏此前著述中早已出现。

其一,《上李观察书》提出“史有专官”的观点,建议史书中设立“史官”一门,“至于史官建置,刘氏知几考证已详。自唐以来亦须遍考,编于各类之末,以昭职守”。而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既已成书的《和州志》中即有“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⑥的论断,“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⑦,并强调设立史官传的重要性,“夏礼能言,无征不信者也。他若聚众修书,立监置纪,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愿,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⑧。至于《上李观察书》中提出“史有大原”,建议“自黄帝六史以来,经传凡属史书一门,无论有书无书,均宜考订,名之曰古史,列于正史一门之前”的观点,章学诚在乾隆三十八年曾对郑樵考镜

源流的做法大加赞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⑤亦曾对古人引经据典的弊端加以批判：“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⑥这些皆是其倡导追溯“史之大原”的理论先声。

其二，《上李观察书》指出经学乃史学渊源：“今按《春秋》《尚书》，俱是史学纲领，其后《汉魏春秋》《汉魏尚书》，乃得有所统宗。《周官》为《职官》之祖，《仪礼》为《仪制》之祖，《礼记》为《记传》之祖，莫非史学渊源。”而在章学诚《校讎通义》中对于史学源流的考查，亦追溯至经学：“刘氏《史通》述《尚书》家，则孔衍《汉魏尚书》、王邵《隋书》，皆次《尚书》之部。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并且，在《校讎通义》中，章学诚认为天下各类著述皆源自经学，“《汉志》叙录云：法家者流，出于理官。盖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于礼官。盖名物度数，《周官》之礼典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强调只有在目录处理中寻根溯源，“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⑦

其三，《上李观察书》中对于史部范围做了广泛的界定，“经史子集分列四库，由来旧矣，然史所赅极广，有宜采于经、于子、于集兼及类书者”。而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就曾曰“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于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⑧。这里，章学诚已经发现史部包罗广泛，经部、子部皆隶于史中。

其四，《上李观察书》中关于经部、子部、集部的具体著录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与章学诚在此前提出的许多观点亦极为相似。《上李观察书》阐述对于经部的处理，“诸经既关乎史，则本经白文即当著于录，

而经义已有其书，但注‘详《经义考》’，以见详为表里之意。……此其采于经者也。如吕不韦《春秋》、韩非《储说》，关于记事之篇，不可不历法参取”，这其实就是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提出的互著法，“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⑨。针对以往“类书向入子部”的现象，《上李观察书》中提出对于子部类书的处理“宜采有原委者，如博物、典汇、经济类编之等，入故事门”。而在《校讎通义》中，章学诚对于类书的归属阐述则更加系统：“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⑩这里，学诚对于类书中“有源委者”“附史部故事之后”的安排与《上李观察书》中的“入故事门”的著录原则完全一致。

《上李观察书》对于集部著录的阐述最详。如关于集部中的碑碣记传状录，认为其属于“史氏传记一门之要删，必取摘篇卷，著于录，以成大观”。而章学诚在《和州志·文征》中设《征述》一门，即专收志状碑铭，“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⑪。此后，章学诚在《永清县志·文征》中设《征实》一门，明确指出“《征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其内容即为传状碑刻，“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已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也。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⑫。因此，章氏这种把碑、铭、序、述等虽无传记之名而实具传记之质的文本统入“传记”类下的观点早已产生。再如《上李观察书》中“凡文集中诏诰奏议，旧归集部者，宜采篇卷入故事门”的观点，在章学诚《校讎通义》中就有“制诰与表章之类，当归故事而附次于《尚书》；焦氏以之归入集部，则全非也”^⑬的论断，对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中将制诰表章归入集

部进行批判。又如《上李观察书》针对“《新唐书志》有文史一门,论史诸书皆入集部”,认为“宜取论文诸书有论史者,概入史评之下”。而章学诚《校雠通义》中对“文史评”一门的收录原则作了系统阐述,“评点之书,附于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辩流别之义耳。……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于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矿之《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于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辩流别之义耳”^⑤,书中“文史评”下的“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及“点识批评”之作,就包括《上李观察书》中“史评”下的“论文诸书有论史者”。

章学诚曾曰:“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注之名。”^⑥表明其校雠学理论的独创性。反观《上李观察书》署名作者周震荣,其虽好读书、藏书,“购书都市,兼车累筐”^⑦,但并不以史学或目录学见长,其传世文集《四寸学残存》中关于校雠理论的文章,除《上李观察书》外别无他篇。此外,《校雠通义》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章学诚游大梁被盗,而《上李观察书》作于次年,信函最后两句“以上诸条,记忆所及如此,未足尽《史籍考》之体例也”,也与彼时章学诚失去《校雠通义》仅凭记忆陈述的状况相呼应。因此,综合《上李观察书》写作时间及内容等诸多因素推断,《上李观察书》虽署名周震荣,实乃章学诚所撰,该文其实是章学诚对自己以往目录学理论的归纳、总结与提升,章学诚才是《史籍考》内容与体例的最初设计者。

李调元在章学诚的启发与建议下,产生“将纂”《史籍考》的想法。那么,章学诚为什么要借周震荣之口而不是亲自向李调元阐述自己的编纂设想呢?这有其难言之隐。由于乾嘉时期注重训诂考据的学术风气,义理之学受到打压,哪位学者若有义理的生发,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⑧,即便是因“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闻名的戴震,“及戴著

《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而“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箴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⑨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章学诚惊世骇俗的史学观点,更是不被时人接受,“故为先生之学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鹜之……则先生之书之不大显于时也,固其宜矣”^⑩。章学诚曾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⑪因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著成《校雠通义》中《原道》诸篇,除业师朱筠、好友邵晋涵外,“质于朋辈,莫不哑然引去”^⑫。嘉庆元年(1796),他初刻《文史通义》若干篇求教学界,却因文章“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受到“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⑬的讽刺,可以想见章学诚在当时学术圈中孤立无援的尴尬情状。

章学诚的学术观点不被时人理解,直接导致其入幕之难。乾隆四十六年(1781),章学诚曾经托付邵晋涵,以“不乖今人之视听,而不掩鄙人之所长”,向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引荐入幕,但毕沅以“覆以缓商”^⑭为借口推脱了。有鉴于此,章学诚曾提醒师友不要与他人道及自己的学术主张,“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⑮。及至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成书后,为避免时人的抨击,亦并未敢公之于众,“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资,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⑯。有鉴于此,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六年底由河南到北京,当与本年才擢授直隶通永兵备道的李调元相遇后,当章学诚在谈话中提出编纂《史籍考》的建议时,他虽对编撰体例早有腹稿,但考虑到二人接触时日较短,尚无深交,更主要的是出于

对自己的目录学观点多不被时人理解的顾虑,未敢冒昧与李调元直接交流关于《史籍考》编纂的诸多想法。在章学诚的官员朋友中,除朱筠理解并支持其史学思想外,尚有时任永清县令的周震荣。乾隆四十四年(1779),章学诚纂《永清县志》成书后,周震荣曾“置酒高会,出《永清志》示坐客”^⑦,表现出对章学诚史学才华的欣赏。因此,章学诚认为借助在学界与政界皆有一定影响力并为学术知音的周震荣,比自己这样一个不被世人接受的底层士人直接向李调元陈述,应有更大的说服力。周震荣对章学诚编纂《史籍考》的实施方案极为赞同,章遂趁热打铁,以周震荣的名义起草书信后第一时间向李调元致函。《上李观察书》的观点得到李调元的认可,只因李调元随后获罪落职,无暇无力顾及《史籍考》的编纂而作罢。于是,此后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章学诚在投奔毕沅幕府时,再次以周震荣作为引荐人,将周震荣说成是《史籍考》的最初提议者,并且由周震荣向毕沅陈述《史籍考》编纂的诸多问题,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

三、《史籍考》的编纂促使章学诚史学理论走向成熟

早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上李观察书》中,章学诚即指出《经义考》中小学一门收录之不足:“历代《艺文志》有小学一门,《尔雅》《三仓》,训诂一例之书也,乃有《尔雅》,无字书韵书,则小学不备”。而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翁方纲作《经义考补正》时,才发现《经义考》中“小学未能自为一类,宜与宣讲立学同补,拟以愚得,续录成帙”^⑧,才有谢启昆编纂《小学考》之役。这既表明章学诚高远的学术视野,又显示出《史籍考》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所建构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博大融通。因此,《史籍考》的编纂工作虽断断续续,但章学诚在开展这一“不朽盛业”的过程中,收获颇丰。此前,章学诚对于目录学的独到见解只能付诸于地方史志的编纂实践,因此,他虽强调“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但由于方志内容与规模所限,运用正史或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方志,有时未免分类繁琐,甚而有小题大做之嫌。

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编纂《和州志》时,和州地区原本书籍较少,章氏仍按照《七略》的图书分类原则著录一州之书,从而导致每类目下内容极少的尴尬状况,迫使章学诚不得不做出“其类例所无者,则姑阙之,以俟补缀”^⑨的变通处理。对于《史籍考》这种收录历史书籍的专科目录著述的编纂,章学诚可完全将他积蓄已久的史料学、文史书籍编纂学及目录学的方法和理论,用于其中。而在编纂实践中,又促使其校雠学理论乃至文史理论得到极大生发,“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间亦宜有所卓也”^⑩,学诚在此语中提及的其学术黄金时期“五十六十之年”,即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庆初年,而这一时间段正是其编纂《史籍考》的整个过程。

一个人学识的增长,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说,一次深刻的交流,一篇深刻的文章,一个静谧的环境,是产生灵感的助燃剂,而对某一问题深入持久的思考则是激起智慧火花的原材料。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章学诚提出《史籍考》编纂设想至嘉庆四年(1798)后被迫放弃《史籍考》编纂这段时间,章学诚的理论创作迎来一次次高峰。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间,他主讲的永平敬胜书院生徒赴试散去后,“自七月初三日置册,结草讫九月初二日,阅两阅月而空册已满,得书七篇,分八十九章,三篇不分章者不与,总得书十篇,记字二万有余”^⑪,其《文史通义》中的《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两篇皆写于是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史籍考》开局后,其作《论修史籍考要略》,从“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官制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择宜详”诸方面,详论《史籍考》在资料收集、内容考订、著录方法上的具体工作,较之《上李观察书》更加系统、深入。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史籍考》搜集资料阶段,学诚“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⑫,于是在《校雠通义》被盗八年之后,对其重新编订校正,“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

又大异矣”^③。并且此时,章学诚正式将《校雠通义》从《文史通义》中独立出来,单独成书,表明其校雠理论已自成体系。而就在《史籍考》编纂工作中,学诚“比日与洪、凌诸君为中丞编《史籍考》,泛览典籍,亦小有长进。《文史通义》亦庶可藉是以告成矣”^④。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这短短的十几天,就写成《文史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⑤。在毕沅失势、史局解散的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课诵之余,得以心力补苴《史考》”^⑥的过程中,集其文史思想及理论之大成的《文史通义》终于成书。

在编纂《史籍考》的过程中,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治学宗旨,探讨天下典籍之本源,“六经皆史”的观点逐步形成。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章氏就曾有过与史、子、集三部相通的论断:“《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⑦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在《上李观察书》中又提出“史所赅极广,有宜采于经、于子、于集兼及类书者”的著录原则,认识到史与经、子、集的相融关系。乾隆五十三年《史籍考》开局,章学诚以史籍“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为宗旨,开展资料搜集工作的过程中,发出的“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⑧的宏论,成为“六经皆史”的先声。在此基础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其所撰《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其所撰《经解》《释通》《原学》《史释》《史注》《传记》《文集》《黠陋》《家谱杂议》《墓铭辨例》诸篇对通史、掌故、史注、传记、文集、谱牒、墓志铭等诸多文体发展演变进行系统阐述,皆是在史籍搜罗中形成的心得,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也是“六经皆史”观点的理论升华。

日益成熟的史学理论,又促使章学诚对《史籍考》的编纂工作不断完善。嘉庆三年(1798),章学诚入谢启昆幕,继续编纂《史籍考》时所作《史考释例》,对书籍分类、著录、考订的阐述较之《论修史籍考要

略》又有很大的提升。“考订贵详端委,求于书之精要者也;著录贵明类例,求于书之面目也”,于是他将之前的一百十二目归为十二纲,五十七目。较之原子目,有增加,如“史稿向不著录,今从诸书记载,采取而成,乃属创始之事,若无凭籍,尚恐不免遗漏,盖前人于此,皆不经意故也”;有删减,如“编年之中,原分实录、记注二门,今以日历、时政记、圣政等记均合于实录,而以记注标部”;有改进,如在仿朱彝尊《经义考》“先分四柱”体例的基础上,对于书的卷数“间有不注所出,今则必标出处”,“所以明其信而有证,此朱氏未有之例也”^⑨,从而使整部著述结构更加清晰,类目更加分明。至此,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逐步建立起宏大的史学专科学目录新体系,形成古今学术之间圆融通达的理论构架。

章学诚虽然一直努力将其独树一帜的史学理论用于史书的编著,但终其一生,除《永清县志》外,其所编纂著述多未能流传于世,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章学诚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但由于“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废”^⑩。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亳州知州裴振之邀,编修《亳州志》,但终因裴振的去任未能刊刻。乾隆五十七年(1792),系统展现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湖北通志》,也因新上任湖北巡抚惠龄不喜其文^⑪,校刊陈煊失心瞽说,最终未被刊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章学诚提出编纂《史籍考》的设想,先后得到李调元、毕沅、谢启昆、潘锡恩等诸多封疆大吏的赞助与支持。他们对《史籍考》的编纂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表明时人已认识到此乃“不朽之盛业”^⑫。而《史籍考》的编纂自乾隆四十七年章学诚提出,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付之一炬,历时长达半个多世纪,亦未能成书,令人遗憾。其原因既有梁启超先生所言的“造端太宏”^⑬,有章氏应对学术“因应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突变导致的源流不明”^⑭而产生的“抉择去取”时的“搔首苦心”,而章氏自始至终试图将其不被时人理解的目录学思想及文史理论倾注其中,导致与合作人产生意见分歧,进而影响编纂进度亦是主要原因,“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

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讎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⑥,而这正彰显出章学诚史学思想具有时人无法超越的进步性。

四、余论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最早谈到《史籍考》编纂的第一手材料《上李观察书》得出,章学诚乃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虽然《史籍考》最终未能成书,但章学诚作为《史籍考》的首倡者和总设计师,一直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校讎乃至史学理论贯彻其中。章氏承认自己“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但他坚持“用其专长,殚经究史”,虽“江湖疲于奔走”,却在“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⑦,找到了人生乐趣与价值,形成“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长而用之”^⑧的远大的学术理想,无私的奉献精神。一旦他的思想及理论在实践中受到阻挠,他则宁可放弃物质资助,也要捍卫己见:嘉庆三年(1798),在章学诚“遍吁请于显贵之门”^⑨的努力下,时任浙江布政史的谢启昆接续《史籍考》的编纂工作。但是,当章学诚《史籍考》编纂的诸多观点与谢启昆产生严重分歧后,他没有因谢氏地位而退缩,因面临由失业而陷入窘迫的生存状态而妥协,而是宁可离开谢启昆幕府也要坚持自己的理论。也正是由于章学诚对自己史学理论的坚持及在史学研究中的忘我境界,为中国史学史留下宝贵的理论遗产。

在乾嘉时期以考经为务的学术背景下,章学诚以《史籍考》的编纂为契机,对史学宏大的理解与建构,从探寻史学源头所展开的学术批判,用史学思维阐述义理所发出的诸多惊世之论,成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⑩,为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创建了理论先声。因此,《史籍考》的编纂对于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成熟,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注释:

①林存阳:《〈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第135-150页。

②乔治忠:《〈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8-45页。

③李金华:《〈史籍考〉编纂问题新探——周震荣〈上李观察书〉考析》,《文献》2013年第1期,第184-191页。

④章学诚:《上毕制府书》,《章学诚遗书·补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1页。

⑤周震荣:《上李观察书》,《四寸学残存》,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抄本。

⑥李调元:《函海总序》,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7页。

⑦李调元:《函海》,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氏万卷楼刻本。

⑧李调元:《函海总序》,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上册,第367页。

⑨查阅《函海》初刻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氏万卷楼版本,共二十函,前十函专门收录汉代至明代的巴蜀稀见文献,第十一到十四函专门收录杨慎的著作,第十五到二十函收录李调元本人的著作。

⑩章学诚:《史考释例》,《章学诚遗书·补遗》,第615页。

⑪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4页。

⑫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族孙汝楙论学书》,第224页。

⑬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与严冬友侍读》,第707页。

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第860页。

⑮章学诚:《与家守一书》,《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和州志·志隅自叙》,第887页。

⑰章学诚:《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⑱沈元素:《章学诚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七,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排印本,1923年。

⑲章学诚:《校讎条理》第七,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⑳章学诚:《原道》第一,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4页。

㉑章学诚:《感赋》,《章氏遗书》卷六,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㉒参见李金华:《〈史籍考〉编纂问题新探——周震荣〈上李观察书〉考析》,《文献》2013年第1期,第184-191页。

㉓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和州志·艺文书序例》,第913页。

㉔学诚:《原道》第一,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65页。

⑤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第932页。

⑥章学诚:《申郑》,《章氏遗书》卷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⑦章学诚:《别裁》第四,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24页。

⑧章学诚:《焦竑误校汉志》,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二,第65页。

⑨章学诚:《宗刘》第二,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6页。

⑩章学诚:《互著》第三,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15页。

⑪章学诚:《宗刘》第二,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11页。

⑫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和州志·文征序例》,第578页。

⑬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五《永清县志·文征叙例》,第1034页。

⑭章学诚:《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二,第65页。

⑮章学诚:《宗刘》第二,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一,第12页。

⑯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第817页。

⑰章学诚:《周笈谷别传》,《章氏遗书》卷一八,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⑱章学诚:《答邵二云书》,《章学诚遗书·佚篇》,第644页。

⑲章学诚:《朱陆篇书后》,《章氏遗书》卷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⑳张尔田:《章氏遗书序》,《章学诚遗书》卷首,第2页。

㉑章学诚:《校讎通义自序》,王重民:《校讎通义通解》卷首,第1页。

㉒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上晓徵学士书》,第649页。

㉓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章氏遗书》卷二八,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㉔章学诚:《与邵与桐书》,《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㉕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㉖章学诚:《与汪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㉗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二岁”条,

《胡适文集》第7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㉘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序目》,《经义考补正》,《丛书集成初编》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㉙章学诚:《和州志·辑略》,《章学诚遗书·外篇》,第560页。

㉚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㉛章学诚:《癸卯通义草书后》,《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㉜章学诚:《与洪稚存博士书》,《章氏遗书》卷二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㉝章学诚:《跋酉东戎春志余草》,《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㉞章学诚:《与孙渊如书》,《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㉟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二岁”条,《胡适文集》第7集,第71页。

㊱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二岁”条,《胡适文集》第7集,第74页。

㊲章学诚:《驳文选义例书再答》,《章氏遗书》卷一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㊳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章氏遗书》卷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㊴章学诚:《又上朱大司马书》,《章学诚遗书·补遗》,第608页。

㊵章学诚:《方志辨体》,《章氏遗书》卷一四,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㊶章学诚:《刘湘煌传》,《章氏遗书》卷二六,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㊷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章氏遗书》卷二八,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㊸梁启超:《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4页。

㊹傅荣贤:《学术传承与创新——论章学诚的“文史校讎”路径及其得失》,《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5期,第68页。

㊺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三《家书二》,第817页。

㊻以上引文见章学诚:《与史余村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九,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㊼章学诚:《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章氏遗书》卷二二,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

㊽章学诚:《又与朱少白》,《章学诚遗书·佚篇》,第641页。

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9页。